

陈智德 2007-08-25

(编注：如果要谈“工人文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近十多年来，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工人文学彻底地衰落。所以现在黄庆云的《香港归来的孩子》，以1922年海员大罢工和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世界工运史上最长的罢工)为背景，特别值得注意。)

约两星期前，在书店赫然发现资深儿童文学家黄庆云女士的新着《香港归来的孩子》，一部以四名儿童至少年为主要叙述角度的历史小说，把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罢工事件，化为少年们的成长故事，重建消逝的历史及其理念，重现更重视卑微者的挣扎和尊严，书中的革命力量来自对抗争的描述，也来自革命理念的延伸，读毕十多万字的长篇后，满载罕见的力量和反思。本书是小说，也有很强的写实性，重要史实都根据多年资料搜集所得，更访问过六七十位当事人而得到第一手数据。故事由一九二二年在香港发生的海员大罢工开始，以两个海员家庭及其年幼子女的经历为故事主线，而重点放在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众人离港北上的革命历程。

比暴力更大的恐怖

小说的前半部分，特别是香港时期，详细描述当时殖民地的压迫力量，包括殖民地的法庭、警察、官员以至教育，在第三章的结尾，木板隔间房之间种种众人的纷扰，都在最后被「读番书」的学童那歌颂英皇的殖民地教科书诵读声盖过，殖民地的压迫于此，在暴力以外显出了更巨大的可怖。

故事首个转折点是冬冬到船上找父亲，海员叔叔带她走进船仓，一个与甲板截然不同的没有阳光的世界，海员叔叔交代海员的真实生活，没有掩饰阴暗面，其实是叙述者的写实安排，道出与浪漫想象相反的真实生活，带着反童话的笔触，仔细而残酷地呈现：无论在海员与海员同事之间还是工人与管工之间，都充满着劳苦、赌博、疾病、欺骗、死亡的故事，当然工人的痛苦，更大程度是由于船公司为谋取最大利润而尽最大可能的剥削。海员叔叔再谈及公司不准一名死在船上的海员尸首带回陆地而必须弃在海上，经工友争取才得以把尸首带回陆地，而说到最后，那已死海员就是冬冬的父亲。

接着写一众海员协助冬冬一家，在青山十三咪(深井附近)以「香港中华海员工人联合会筹备会」的名义立碑并埋葬其父。小说根据历史，部分人物沿用真名，其中一位海员叔叔苏兆征即真有其人，在本书中也多次出现。苏兆征(1885-1929)是早期中共著名的工运领袖之一，十八岁到香港谋生，任职海员多年，一九〇八

年加入同盟会，至海员大罢工时期已为工运领袖，在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中亦有记载。海员大罢工之后，苏兆征在一九二五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以香港海员身份被选为执行委员，在省港大罢工时期以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组织工运，亦曾在《民国日报》及《工人之路》等刊物发表工运文章。

## 理想与现实的历史

香港的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历史，已有不少文献记录，黄庆云据当事人的访谈化成小说故事，把历史更生动地呈现，包括海员工会牌匾被警察没收后，工会争取到由警官及会督举行仪式公开交还的情况，以及为突破港府新闻封锁，香港工人散发报道五卅惨案的传单，方潮带冬冬自开行中的电车跳出以逃避便衣警察的跟踪等情节。

第十一章「再会吧，香港！」，讲述罢工后香港居民联群结队返回广州，篇目「再会吧，香港！」来自抗战时期由田汉填词的著名歌曲。小说故事在此气氛大转，众人在香港时是写殖民地的压迫及工人的对抗；回广州后，「在革命的土地上」、「快乐的大团圆」、「工人自己的政府」等章节中，呈现一片初期社会主义理想的气氛，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互助甚至人人没有缺点的基层人民乌托邦，过着所有人分担所有工作同时共享资源的公社生活，「工人自己的政府」就是指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内部严密如一个政府，书中描述它的所在，原是一处已残破的游乐场遗址，省港罢工委员会就在该处修建出调查处、法制局、审计局、训育处、庶务处、交际部、游艺部、宣传部、会计室等等多个部门，还有配枪的纠察队，连监狱也有，打算用来审问和监禁「出卖民族利益破坏罢工的坏蛋」和被公安局放走的好商，但似乎未能完全实行，审讯过的犯人还须交回公安局处理。

小说写到罢工开始，尤其众人返回广州后，不免有点美化，工人因罢工而成了主人翁，而且「现在人人都知道劳工是神圣的」，作者的描述其实也有史实根据，大罢工的成功引发一种乐观的气氛，「劳工神圣」和「劳动创造一切」的讲法传颂一时，甚至本身不是工人的进步学生也因崇拜工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工人装束，使广州整条街都是工人打扮的人在逛。当时情况可能真的这样美好，但在其笔调中仍可看出美化的用心，特别与香港部分的残酷呈现对比出两种写实态度，对内地的美化倾向带着一种理念上的肯定和认同，自然地在呈现时亦使用一个认同的框架，选择并强调对革命和斗争的热诚。

## 解放个体的文学斗争

作为一部青少年小说，对于本书中的少年人角色，读者一直等候知道他们对革命事件的感受，特别是一个少年人由旁观大人物的革命以至成为革命一分子的心路历程，我想如能在这方面再多交代或可更立体些，亦使那革命的理念更具基础。

在传统的革命文学、斗争运动的描述中，个人的想法微不足道甚至一再加以贬抑，革命中的个人情感没有半分地位，小资产阶级的情绪被认为不值一提，过去较多反省的作品如杨沫《青春之歌》，到最后仍不免否定主角林道静的情感。走上革命之路、回到与群众立场一致的路就必须先消灭自己的情感，在今天看来，革命的激励性、斗争和反抗的理念可敬又带着更大的悲哀。

如果时代是像某种历史观所言，是不断进步的，那么可能过去那种因应特定斗争需要而形成的个人对社会、革命对情感、知识分子对普罗大众的严整对立面，也许亦可容许作调整。这里无意否定过去的立场，真正认识历史的话，会了解不是所有二分的对立都不可取，二分对立原是斗争的必然，至少是一种策略，亦必须经过这样严正的二分才能达致革命，对二分的批判其实是回顾之后产生的想法。不过必须这样对立的时代或已过去，正如我们在今天会认为发展与保育不是一种二分的观念一样，今天的革命和斗争当然需要对抗，但对革命的书写本身应有更多个体的生命，以利润和市场衡量一切的思维不需考虑推土机下的个体感情和人文经验，斗争者以革命的方式对抗压迫机器，而书写斗争的文学者要做的也许不是重复或停留于记述其对抗，而是把机器下被压迫的个体情志解放出来。

如果今天这时代还需要有书写革命和斗争的文学，它也许已不需像五六十年代般贬抑个体情志，因为今天的压迫机器正正就是一具贬抑个体的机器，文学者对被压迫的个体，透过记录、转化、象征，重建个体情志再催生新的反思，真正具斗争意义的文学针对压迫机器对个体的压迫，以重建个体情志作抵抗，由此而达致一种解放。

《香港归来的孩子》中一个一个参与革命的少年，离开香港后从广州再转战于广东农村不同城镇，大部分没有再回到香港，「香港归来」是站在内地而言，重点写他们返回内地之后的经历，包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工人纠察队在农村与土匪的战斗等。这里因应篇幅难以再论，尤其从香港出发的革命流动，其复杂意涵有点类近四十年代黄谷柳的《虾球传》；亦难以说清本书带来的震撼，它不止记录一个年代，也重现失落于历史资料的革命感召力。历史数据形成认知、分析和评说，文学却把历史无法处理的情志和理念重现，在本书当中，重现本身已作为一种感召和精神力量，催生并推动理念的延伸以至实践，基于写实而超越了写实，历史的断裂因此而得以消除。